

目 录

骆敬瞻与永济埝.....	黄德孝 (1)
创办明耻中学的回忆.....	税国楨口述 谢必友记录整理 (3)
遂宁私立仁爱初级中学始末.....	吴伯章 (7)
遂宁公园回溯.....	李德霖 (11)
吴启亮轶事.....	喻玄华 (13)
斗城拾零.....	李远煥 (15)
谢绍周诗选录.....	蔡 志 (16)
从黑暗走向光明 (续完)	赵洪新 (17)

骆敬瞻与永济埝

城关 黄德寿

遂宁城东二十里的永济乡，原名“射洪嘴”，场口外面有一座土埝，名“永济埝”。据遂宁县志记载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其源出赤岩沟，流程五十余里，沿途小溪二十二道汇集于此。水源充分，经冬不涸，适宜筑埝，蓄水灌田，于民有利。当时县令田朝鼎倡修，地方士绅，群众出钱、出力、历时七月建成。耗资八百余两（银子），费工（石、铁、土）一万余个。

其建筑方法，纯系采用土法。用条石砌一条长一百五十丈，高一丈宽二丈的埝坎把水拦住。埝基约四丈，埝上修一缺口用以排水。该埝建成后，再于埝首左右顺势修渠，可引水灌田万余亩，使洋渡坝、旗山坝及沿河两岸的瘠地荒地变为良田。为了纪念该埝的落成，当地人民愿利济之永，故定名为“永济埝”，并勒碑以记，永志不忘。

可是该埝是用土法修建，泥、石混合，长年累月经水冲刷，其埝坎泥沙流失，基脚垮塌，加以年久失修，所以年年培修，年年冲垮。当地人民感到非常苦恼，成为灌区人民沉重的负担。

一九三五年（民国二十四年）春天，四川省第十二行政督察专员兼县长罗玺，应当地人民的请求前往视察，了解民困。罗知道了这一情况后，聘请骆敬瞻为顾问，前往勘察设计。

（骆敬瞻资中人，骆状元的儿子，曾留学德国攻读电机工程专业又兼通土石建筑工程，学成回国后怀才不遇，被罗玺聘为专署顾问）。经详细查勘后，经仔细研究，决定在原基础上重建。于是设计制图，按图施工。首先基脚深挖到硬底，再安砌条石，石隙用石灰灌缝。整个工程较原埝长十余丈，称为“附埝”，在“附埝”中都设计了一冲沙孔，当时人们称为“水风箱”，利用流水冲力把泥沙从“水风箱”中排出，免致淤塞。迎水面用碎石砌成斜坡，上面铺以三合泥，水满则从埝坎上缓缓流下，形同瀑布，该埝建成以来从未发生过垮塌事件，至今安然如故，骆敬瞻在施工期间栉风沐雨，忘我劳动。每天带着一个姓王的助理员在工地上东察西看，手里拿一块二尺长的楠竹块，对每一条石头四面八方都要仔细察看，运用竹块敲敲听听发出的响声，便知道石头的质量是否合格，王助理员跟着他，按他的意旨用钢尺量大小长短，是否合格，如发现不合格的立即叫工人抬开，留作别用。有时他还帮着抬。在旧社会里，一个流洋回来的大知识分子，能有这种深入实际吃苦耐劳的精神，真是难能可贵啊。

原来当地群众为了多蓄水、多灌田。于骆走后又在埝坎上增加了一轮条石，粗看似乎没有什么，但仔细观察它与原埝设计有点不相适应的感觉，但确是发挥了更大效益。

创办明耻中学的回忆

税国祯口述 谢必友记录整理

一九三三年初，我中学时代的老师，遂宁县中校长全文炳，出于对教育事业的负责，罗织人材从教，极力劝我停学教书。从此我走上了教书的生涯，在讲台上度过了四十三个春秋。

当年初应聘在遂宁县中任教，同年秋又在县女中兼课，抗战期中又代理遂宁县中校长。从教后，我发现国民党的公立学校问题不少，教学质量很差。国民党专署、县府在经费上层层扣，学校到手经费，不足购置学生所需的课桌凳。校方伙同专、县政府吃教师缺空，领薪的人多，教书的人少；专、县政府又随意安插关系人，滥竽教师队伍，这些人或责任心不强，教“发水书”，或开学之后，姗姗来迟，致使缺课太多，很多课程应授未授，而且规定开课二十周，实际不足十八周。学校不能自主办学，专、县政府和社会恶势力随便塞进新生和插班生，学校不能按成绩录取新生和转学生，升、留级不敢逗硬，看人看事。我深感不排除社会上对学校的重重干扰，是办不好学校和难于培养出人才的。抗日战争中，遂宁已是川北重镇，还设有军用机场，成为日寇空袭和骚扰的目标，县城及近郊人民不能安心生产和工作，学校也无法正常行课。在遂宁中等学校筹备迁校，向乡间疏散，以躲避敌机空袭中，我以遂宁中学代理校长的身份，参与选择暂住校址的工作，跑遍遂宁附城永兴、仁里、新桥、桂花等乡较大的祠院、寺庙，我内心深处萌发了摆脱国民党政府的束缚，私人集资办学的念头。我的这个想法与几位楠好同事摆谈后，得到了他们的积极支持。

一九三九年冬天，我与本县教育界几个知名教师和一些社会贤达名流共商集资办学。商定由税维城（遂宁市中区横山乡人，退伍军官，原杨森部副师长，因傲于国民党部队的黑暗腐败，愤而辞去军职，在家赋闲，急公好义，人望甚高，是我堂侄辈）；雷特起（遂宁市中区河沙乡人，川大中文系毕业，中学语文教师，当过督学，有教育行政管理经验）；王好美（遂宁市中区河沙乡人，成都第一师范中文系毕业，中学语文教师）；许昌良（遂宁市中区人，川大化学系毕业，中学化学教师）；余蜚（遂宁市中区人，川大化学系毕业，中学化学教师）；谢文高（遂宁市中区观音乡人，上海大夏大学史地系毕业，中学史地教师）；甘君藻（遂宁市中区城关人，文化界知名人士甘光璋之子，国民党专员李泽民的秘书）；胡秉文（遂宁市中区城关人，笔杆子，语文教师，国民党县府秘书）；童国璋（遂宁市中区域关人，遂宁省立三师范毕业，遂宁友文书局经理）；曾仲钊（遂宁市中区域关人，涪泰银行和苏州织布厂经理）；刘杰（遂宁市中区河沙乡人，四川美术专门学校毕业，美术教师，以后任遂宁县国民党县党部副书记长）和我共十一人组成董事会，公推税维城担任董事长。一九四六年秋吸收周宇澈老师为校董。董事会办事机构先设现在大北街甜食店地址（正对大西街口），后迁友文书局（现在市科协所在地）并首推许昌良第一任校长、副校长为税国祯。鉴于抗日时期，遂宁乃川中重镇，日机常来轰炸。校舍设于桂花镇所辖的梓潼寺和龙池院，因办学系公益事业，获得当地开明士绅刘元吉等人的大力赞助，学校仅设筵数桌酬谢当地士

绅，未交分文租金。校名是由税维城、雷特起和甘君藻共议。因学校开办，正值抗日战争节节败退之际，遂取“明耻教战”以雪国耻之义，起名曰“明耻中学”。以鼓励和教育学生发扬爱国、救国思想，奋发学习以雪国耻。并由雷特起草拟校训和校内规章制度。为了筹措办学设备，董事会多数成员都献出自有的图书和家俱，以充实学校设备，共得图书两三千册，还有一套珍贵的万有文库，一台收音机和一套人体解剖图，以及一些床桌凳，用以部分安顿教师的食宿和办公。我还献出了爱人吴孟琼的部份嫁妆。上述图书、家俱都作为校产，正式列帐上报。同时，根据开校招生需要，学校置备了三个班使用的课桌凳和床板条凳，在一九四〇年初匆匆开校。学校草创伊始，教学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由于学校校董、校长吃苦在前，办学认真，全体师生共同努力，寝室没壁头，校园四周无围墙，是边行课边整修，逐步完善。白天在校本部梓潼寺上课，夜自习结束，时间已过二十一点，再由值周导师带领同学，打着灯笼火把到一里之外的龙池院住宿。沿途是山路和坡坎，一次墨黑天，英语老师周子敬（巴逝世）在中途火把熄灭，不慎跌落山沟。由于办公桌椅和床板不够，教师只好把床板放在条凳上，白天当办公桌，晚上又铺上被褥睡觉。这种一物两用的床板，我还没有份。只得把菩萨打倒，将神龛打扫干净，权当床用。为了减轻学生经济负担，一度执行过凡属校董授课仅在学校吃三顿饭，学校只对董事以外的聘任教师发放月薪。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耻中学自始至终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一文钱补助。学校始终坚持自力更生，以学养学。收费低于县内其他私立中学。每期开校收费之后，学校全部用以买成米煤油盐及其他实物，全校师生得以幸免物价波动之苦，而且，能坚持每学期末不追加伙食费，这是其他学校办不到的。另外，每学期初，学生入学报到时都得带上一挑土壕箕，一根扁担、一把锄头，作为开荒植树、栽苕种菜和运输的工具。全校师生每学期所需的全部油盐米煤及其他大宗生活和教学用品，都是由师生总动员，从四里之遥的黄连沱木船上，一挑一挑、一袋一袋、一脸盆一脸盆地用人力运回梓潼寺坡上的。龙池院、梓潼寺两处的上山道路、周围的环境整治和绿化植树、梓潼寺的大运动场，都是全校师生课余的辛勤劳动所开辟和种植的。当时，遂宁中等学校有的学生称明耻中学的学生是“煤炭娃”，就是因为他们经常坚持体力劳动锻炼的缘故。

明耻中学因陋就简，艰苦、勤俭办学，教师负责、认真、逗硬施教。学生好学，办学一期便博得社会好评。但却招来了教育界少数败类的诋毁。如中学校长周浩文（巴镇压）诬蔑说：“他们那几个人哪有钱办学，还不是共产党支持的经费”。国民党和政府当局旋即对我校施展政治恐吓和诬陷攻击：一是藉口明耻中学没有办理立案手续，为“不合法”，由督学出面干预。校董会迅速开会决定：凡有产业的校董，拿出全部或部份财产的红契和银行股金证明作经济抵押保证。计有意国璋田谷一百挑，谢文高田谷两百挑，税国祯田谷五百挑，曾仲钊开具涪泰银行股金支票（实系空头支票），以上全部约据与十个班的课桌凳、床板，一齐拍照后在遂宁县地方法院办理了公证手续，然后在省教育厅通过遂宁籍办事员蒋庸帮助立案，取得“合法”手续。二是专员黄绶直接向税维城施加压力，逼迫明耻中学教师集体参加国民党。黄对税说：“你上了圈套，莫要去当董事长，你们学校校董担任教员的没一个国民党员，是赤色学校”，扬言要逮捕主办人税国祯、雷特起、许昌良和关闭学校。为了维护学校的生存，在校七个教师被迫集体参加国民党，建成一个区分部，由专署专案报省批准。三是捏造谣言，蓄意加害。明耻中学师生节假日返城必需途经石溪浩，当时正值四联埝（南北埝在扩建前的名称）石溪浩拦河大坝工程施工，发生民工罢工事件，国民党政府竟诬陷是明耻中学师生挑起，意图嫁祸，终因证据不足，不好下手，其阴谋未能得逞。

明耻中学一至四班学生毕业，均逢全省统考，参加南充片区考试，取得优异成绩，屡受省教育厅表彰。

一九四三年下年，学校在城区通过与庙会主管人员协商，无偿取得禹王宫（现在市粮食局机关）、三元宫前半部（现在市纺织厂北辰街宿舍）两处庙产使用权，随即把高年级三、四、五、六班迁移进城，设校本部于禹王宫，在此授课、上操和吃饭，三元宫作为学生宿舍。乡区仅设分校于梓潼寺，用以办一年级，自此停止使用龙池院。一九四六年下年，学校进而取得三元宫后半部（现在市城建委三元宫周转房）庙产使用权，梓潼寺分校学生才全都进城，明耻中学经过三年的城乡两地分设，至此恢复了集中统一管理。进城后，从一九四三年下年至一九四五年下年期间，贺白光（三青团遂宁县分团干事长，巴镇压）虽曾数次来校发展了几十个三青团员，但学校坚持自主办学，讲学自由，不受社会干预，对三青团不提供开展活动的方便（如活动场地与开会时间），三青团组织在学校没有形成阻遏进步势力发展的势头。学校对不同政治观点的报章、杂志都兼收并容，学校订有民主报、大公报、华西晚报、工商导报、世界知识、新观察、新新新闻和中央日报，李伯达（当时系民主同盟盟员，1948年转中共党员）老师还订过新华日报，雷特起老师订过密勒氏评论报，大大开阔了学生的政治眼界。在课堂上，教师授课都比较自由，不受政府颁行课本和外界政治气候的约束，如李伯达、王好美、雷特起、杨西垣（地下民盟成员）、李武伟、李广誉和徐芝瑟老师，他们讲语文、公民、历史和地理课，都敢于公开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密切联系时事政治进行讲解，启发学生民主性和进步性意识。部分学生在李伯达老师的影响下，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办起《大地壁报》，在壁报社骨干成员雷金声（中共地下党员）的周围团结了一大批进步同学，积极争取光明进步，抨击旧社会的腐败黑暗。一九四五年下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蒋介石为了培植亲信，网罗炮灰，由国民党县政府在中山堂（已拆，在今市政府与市农机局前面政府大街衙面正中心）集会动员中学生参加“青年军”，我校教师李伯达提议：“请彭心明县长带头参加”，彭气恼之下要李也带头，大家说李是瞎子，弄得彭十分尴尬。彭便勾结国民党专署教育科长刘某调了学生作文本去审查，把文中抨击反动政府的内容追究到李伯达的头上，李被迫离校。李武伟也在我校任课，在李伯达出走后，他积极关心大地壁报社的工作，被县府勒令离校，限期出境，在一九四五年秋随李伯达由渝来校的语文教师李广誉、徐芝瑟夫妇（李系民主同盟成员，据说徐是中共党员）一直在校任教至一九四九年临解放，情况一度紧张时，离校回避。

明耻中学一直不设专职训育主任，只设教导主任一人，避免特务机关派遣职业特务进驻学校，用训育主任的名义，专门在学校监视师生的言行。学校进入城市后，国民党政府直接和间接都企图强化对该校的政治思想控制，学校就利用国民党党政要员想多挣“外快”的思想，让其到校兼课，甚至同意他们住校，以溶解其对我校的疑心，便于保护进步师生，掩护进步活动。学校才先后聘请了专署秘书傅工策、徐家礼，地方法院院长李如平，检查官樊某，推事官徐某等担任公民课，到一九四八年春，明耻中学开设高中班时，因为每周只有四点钟的军事课，所以没聘军训教官，政府部门意见很大，社会上有极个别的人有意见，如果聘一军训教官，他一定是由反动政府委派，而且长住校内，专门搞特务活动，学校研究，决定聘专署保安大队长王长全担任军训教官，不住学校，王长全是安岳人，遂宁县中校第六班学生（一九三三年毕业），其姐王杰是遂宁县女中学生，姐弟都是我的学生，其父王某系遂宁县天主教司译，他也与我有一面之交，事前磋商好，他每周只上四节军训课，一般学校事

务可以不参加，有事还可以找个中队长代课。他应聘后，有人说我校学生中有共产党，因他也有责任，故他就极力否认：“那是乱说”。

该校实行校董会，通过互相推选由各董事轮流担任校长，每届任期三学期。前四届校长依时间顺序是许昌良（税国祯副职）、税国祯（余铨副职，为四学期），雷特起（从此不设副职），谢文高。一九四六年秋，校董会多数提议我二轮担任校长。因校董刘杰经常在学校占便宜、拿东西，想当校长而众议不服，刘私欲未满足，意见多，闹内哄，甚至诬蔑明耻中学是税氏学校，由税家把持，我在气愤之下拒绝担任校长。校董会邀请周宇激老师担任干股校董，并担任校长。仅任职一学期，因刘杰常找麻烦，周宇激不堪纠缠而辞职。一九四七年春至一九四八年夏，由刘杰担任校长，了其“宿愿”。一九四八年夏刘杰任期届满，校董会决定我回任明耻中学校长。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曾经发生袁秉衡企图强占明耻中学禹王宫校舍未遂事件。先是国民党县长陈伯良两次找我谈话，说禹王宫校舍原是李家钰的兵工厂，被两湖会馆私自占去的，要学校迁走，并叫我亲自去找袁秉衡。某日，我在街市花园找到袁秉衡，袁说：“禹王宫校舍问题陈县长给你说没有，那房子是李家钰整修过的，我要把学校的东西摔了”。还说限你三天搬迁，过时我要把人开进来，打死人不负责任。我回校开会商议了对付办法：先派二十个学生手执童军棍站岗，如果他派兵来就把大门关上。又由于董事长税维城在城关社会知名人士聚集地方，大西街良友茶社公布了上述事件真象，社会舆论普遍同情和支持学校。袁秉衡慑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始终未敢轻举妄动。

一九四九年临解放时，各中等学校纷纷放假，我校坚持未放假，使中共党组织便于更好地组织学生开展护校和迎接解放。解放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中等学校进行了调整合并成为联合中学（后为遂宁中学），我校档案归并县中（后为一中）。

解放后，学校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一切费用由政府直接拨款解决，学校几经修建，一座座高楼耸立，现代教学设备，教学仪器得以大大的充实。学生人数成倍增加。并且学校按照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出了大批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本人及与之共同筹建明耻中学的同人的“明耻教战，以雪国耻”的初衷，现在才得真正实现了。

遂宁私立仁爱初级中学始末

(1945—1952)

永济 吴伯皋

遂宁私立仁爱中学，(开始定名为湖南衡阳仁爱中学)以一九四四年冬以遂宁过军渡(城南二十里)天主堂为校址。从一九四五年春季招生。同年秋由遂宁天主教接办，改名为遂宁私立仁爱初级中学。一九四六年二月迁到遂宁城关。一九五二年四月交由遂宁专署接办，改名为遂宁二中。现名遂宁城北中学。

一、来 历

仁爱中学原系湖南衡阳天主教创办，董事长于斌，(天主教南京教区主教)校长郭藩。在抗日战争期间，日寇侵入湖南，又先后侵入广西、云南、贵州，该校随着战区的转移，作了多次迁徙，由衡阳迁零陵、柳州、桂林，而后到贵阳、重庆。因郭藩与遂宁天主教神甫黄海若是罗马教廷传信部学校的同学，他们经过洽商，一九四四年十一月郭藩带领该校教职员工及家属十余人来到遂宁，为了解决这批人的生活工作问题，经过协商，衡阳仁爱借遂宁教会过军渡天主堂(城南，距城20里，涪江东岸，背山面水，又当渡口要地)作为校舍，稍事布置，教室寝室、办公用房、家属住地都有安排，体育活动场所也有一定规划，课桌黑板，一律新制。筹备两月，因陋就简，基本具备学校规模。一九四五年一月招收新生一班、约三十余人。一年级二学期插班生二十余人。合计两班学生六十余人。根据以校养校的原则，所收学费(米)除办公用费必要开支之外，所有结余，教职员工分摊支用。生活非常俭朴。这个学期学生来源，主要是过军渡周围地区如龙凤、南强、仁里、过军坝、蓬溪高坪镇等地的农村子弟。有一部份学生走读，也方便了学生入学。

衡阳仁爱中学在遂开办成功，遂宁县增加了一个文化单位是喜事，该校逃难人员解决就业生活问题亦是幸事。但是遂宁同衡阳相距数千里，抗战胜利后，迁校复校又是一个问题，后经多方协商，遂宁教会决定接办该校。

二、校 董 会

先按当时规定，组织了学校董事会，征得各方面同意，定名为遂宁私立仁爱初级中学。董事会名单如下：

名誉董事长 于 斌 (南京教区主教)
董 事 王 文 成 (南充教区主教)
董 事 黄 溥 泽 (南充天主教神甫)
黄 海 若 (遂宁天主教神甫)
颜 志 远 (遂宁城区天主教教会会长)
刘 伯 常 (遂宁城区天主教教会会长)
吴 伯 皋 (遂宁天主教徒, 中学教员)
喻 培 厚 (射洪天主教徒, 社会知名人士)
杨 廷 棟 (遂宁专员公署保安司令部副司令)
王 笃 生 (遂宁船民协会会长、袍哥大爷)
刘 茂 实 (遂宁民福染织布厂经理)
税 维 城 (遂宁县社会贤达)
周 维 幹 (遂宁县社会贤达)
王 伯 渊 (遂宁县社会贤达)
冯 煥 章 (遂宁北固镇袍哥舵把子)
邓 枢 垣 (遂宁县教育科长)

这些董事是仁爱立案的名单。原是教会个别相约的, 並沒有聚集一堂研究办学事宜。校长由黄海若兼任。(郭藩离职后) 他主要经管学校财务工作, 不管教学活动。学校办学资金主要是教会补助, 因而校董事会只是徒具虚名。个别问题上个别交换意见, 1946年下半年才在学校聚会一次, 让校董们了解学校办学情况。1948年上半年为建修学校大楼筹集建设基金, 又召开了一次校董会。

三、立 案

遂宁教会接办“仁爱”, 教内教外人士均表欢迎。唯南充教区领导考虑遂宁教会财力薄弱, 不能满足学校发展的需要, 同时私立学校难能批准立案。因而迟疑不定。这时, 遂宁教会表示, 财务问题自行解决, 立案问题郭藩负责解决。他获得于斌的大力协助, 仁爱顺利完成立案。同时南充民德女中系南充教会所办, 亦被批准立案。

四、更 名

因为, 那时于斌是天主教南京教区主教, 与国民党中央政府关系密切。四川省教育厅厅长郭有守利用于斌求他批准遂宁仁爱立案之事, 反求于斌协助解决儿子出国留学问题。史良律师从中斡旋, 达成协议。后来喻培厚陪同史良律师两次到南充, 疏通郭有守和王文成之间的意见。王文成特备南充上等白绸两匹赠送郭有守。南充民德, 遂宁仁爱同时顺利批准立案。郭有守离职之后曾出国考察教育, 据估计这可能借重了于斌的力量。

一九四五年六月遂宁仁爱初中学校由四川省教育厅批准招生开办。该校把衡阳仁爱所有教职员和一切教学设备都接收过来, 改名为遂宁私立仁爱初级中学校。校址仍在过军渡天主堂, 秋季招收新生一班四十多人, 插班生若干人。这学期全校两个班学生90多人, 学生来

源也扩大了。

同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郭藩立即带领部份湖南教师回衡阳复校。遂宁仁爱校长由黄海若兼任、吴伯皋应聘作教员。

五、迁 校

抗日战争期间遂宁刘方平假借经济部的名义，在遂宁裕丰外街背后，租遂宁教会土地开办小型棉纺织厂，因亏本较大，于一九四五年停办。遂宁教会购买了其所建修的一切用房及有用的设备，计划作为仁爱校舍。一九四五年寒假期间遂宁仁爱初级中学由过军渡，迁入遂宁城关北门外裕丰街新校舍内，教会又拨出街房十多间给学校使用，因陋就简，勉强敷用。

六、背 景

仁爱教会学校，办学资金主要来源于教会。当时学校依赖教会而存在，故仁爱与教会生息相关，教会隶属于罗马教廷，故仁爱与帝国主义亦间接相关，仁爱与当时旧政府亦层层相通。如“立案”所述。于斌郭有守各自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与职权而互相关顾需求。至于地方权势，学校亦有所依靠。为了搞好校群关系，对社会贤达和知名人士更有所借重。至于教内热心教育人士，莫不出钱出力，竭尽心力，玉成此事。

据教内人士传述，帝国主义把清政府庚子赔款，拨出部份给教会作为传教资金，遂宁教会利用这笔资财购置田土1000多亩，本意是将这些土地租给教徒耕种，使其有安定的生产条件（教会不随意换佃）逐步改善生活，（租金略低于一般地租）地租收益用于地方公益事业，使教会博得社会的同情和支持。遂宁教会曾经办有慈幼事业，如慈幼院收养孤女。地租结余上交南充教会，本地爱国教徒与社会贤达察知此事，多年来就怀有不满情绪，都希望遂宁教会多办公益事业，不负初衷。教会为解除社会舆论的指责，早就试图兴办学校为社会培育人才，今接办仁爱时机造成，故教内教外均表欢迎。

仁爱初级中学，表面上未设宗教课程，教会节日也未放假，未叫学生去“做礼拜”，但仍有宗教色彩，教会向港澳教会出版社购置一些宗教图书，宣传教义教规的故事书籍放在图书阅览室，供学生自由阅读，至于大型杂志书刊，学校从未购置。

关于教会办学的目的和意义，据当时教会有关人士说：教会办学的目的和意义是希望青年学生，通过教会学校的教育，对于教会有较多的了解和同情。今后对于教会的发展肯定将是有裨益的。

国民党政府则一开始就严密注视学校师生动向，防止反蒋活动。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国内学生运动蓬勃高涨，遂宁保安大队多次通知学校，叫学生一律回校吃午饭，点名收假，防止上街闹事。遂宁专员李泽民于1948年还密令仁爱校长，“你校吴伯皋、谢密、朱晴光三人有奸伪嫌疑，应严加防范，并急速解聘”，三人知此音息，教学情绪不安，经学校解释，才把这学期混满。

七、解 放

一九四九年下学期仁爱青年教师多，有的思想很进步，如杨重，武胜人，重庆大学法律系毕业生，因搞学运受迫害，来遂宁避难。杨代盛，广安人，美国某造船专业毕业，因胞兄是共产党员，回家无法安身，逃来遂宁。还有郑平轩等更是热情积极的青年，他们经常传播党的解放政策，故校内民主进步空气相当浓厚。

学校座于街道公路侧旁，是蒋军溃逃必经之地，故在解放前夕，学校组织部份师生员工护守学校，使学校财产未受重大损失，部份教师及时参加各种解放组织，搞庆祝活动，迎接解放。解放不久，郑平轩、杨重等随即投考军大，光荣参军，放寒假后，不少教师又被调到公办中学任教去了。

寒假中校董会召集学校董事和老教师召开联席会议，研究学校问题。由于教会财源（地租）断绝，无力补助学校经费，而学校教师约有半数参军或调往他校或解聘离校。在此新形势下学校能继续办或不能办，不能不是一个问题。经过充分研究，一致认为应该继续办学，坚决维护党的教育事业，经过协商推举吴伯皋任校长，采取以校养校的原则，克服财经困难。

八、发展变化

一九五零年仁爱贯彻以校养校的原则继续开办，紧缩一切开支，压缩人员编制，男女兼收扩大学生来源，但学生人数还是锐减，如三年级有一个班仅十人，全校六个班不过百余人，因而学费收入大大减少。教会又无补助，故学校财经状况困难至极，经职工民主决定，学校经费收入，主要用于行政开支和解决职工伙食，少数结余再分摊使用。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师生员工坚守岗位，使学校教学活动正常进行，秩序良好。在反帝爱国运动中，学校积极开展斗争，控诉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文化侵略的罪恶活动，控诉教会增加地租剥削农民的罪恶活动。师生员工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坚决要求学校与帝国主义教会割断一切关系，中国人民要以自己的能力独立办学。故师生的办学情绪不断高涨。年终，由于党的关怀，政府酌予粮食补助，使得职工生活大有改善，更加鼓舞了师生教学热情。

一九五一年二月西南文教部召开西南区教会学校工作会议，经过政治报告的学习讨论和控诉，与会学校负责人共同认识了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文化侵略的罪恶。教会学校必须与帝国主义割断一切关系，独立办学，坚决进行反帝斗争，不再接受他们的办学经费。教部决定大力支持给予经济补助。仁爱在党的领导下，自力更生，积极办学，不失为反帝爱国的先锋。

一九五一年起仁爱得到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在经费上给予补助，学校财经状况逐渐好转，师生员工的办学情绪更加高涨，学校大有起色。到一九五二年四月遂宁专署接办，改为遂宁二中（一九八四年已更名为遂宁城北中学）。

在接交会上县文教局领导一再肯定，解放后，仁爱中学的教职工坚守党的教育阵地，积极投入反帝爱国斗争，使教会学校回归人民怀抱。成绩显著，有功于党和人民。吴伯皋调遂宁一中作教员，学校其余人员和学校财产全部接收。从此仁爱光荣地归属于独立的伟大的中国人民了。

遂宁公园回溯

城关 李德霖

遂宁公园建设，始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据县志记载，民国十五年（1926年）将三门炮台拆去作修公园之用。其园设在城内县衙门后边起名“遂州公园”。其布局是：在县衙门后建有木质方亭，四周相通，有栏有坐，可供休息。方亭对面建有网球场，当时有不少人，喜拍网球健身。方亭前三合土路面通向小北街，靠城隍庙，为一浴室，门前盘扎万年青巨狮一对，工艺精致。

靠近北辰街有茶园，其侧后为国民党县党部。对面为人工曲池，中有炉炭渣建造假山一座，其中用炉渣镶嵌一亭，题名“穴居”围有铁丝网，养有小飞禽，小猴，实则为一小动物园。当时我家有鸱鸢一支，送给公园“穴居”饲养，幼年常去观望。

公园可从大堂坝进入，直通北门，建有砖木结构门庭，门额题有“遂州公园”四个大字，在靠近现在的市人民政府，有用花砖围绕一圈的小院院中有大榕树及常绿灌木，林木掩映，内有大金鱼缸两个，这里禁人入内观赏。

十年后，民国二十四年（1935）前后，李家钰又在遂宁南郊，建“船山公园”，占地二十多亩。公园的园景布置，中心掘有土方塘，曲池有小石拱桥相通。又折迁原“旅安祠”房屋材料，在曲池前建造“仰止堂”该堂背靠船山，初为部队军乐队驻其中，后为“县农业推广所”住地。园内有曲折小道可通。靠文庙一面，建有木质草盖方亭，隔数丈远又有木质草盖园亭，相隔不远建有木质草盖茶西一座。船山芳草萋萋，树木蓊郁，益觉清凉。

当时县长臧尔寿曾在船山之腰建一亭名曰“瞰洛”，其联云：“百里山川收眼底，万家忧乐注心头”。均用木质额之，有小径可登。

公园内还建有宽广的运动场，有检阅台，排球场，靠西门城河边，立有浪桥、天桥、拱架、秋千、木马，为青少年爱好活动的地方。检阅台后数尺建有“抗日烈士纪念碑”，其碑座为红砂石镶砌见方丈余，高与台平，有小石拱桥联结其间。碑座四周有石栏围护，中央以青砖砌竖一见方约五尺高数丈的方正柱碑体，正面嵌有“七七抗日烈士纪念碑”字样，游人从宽阔的广场正面望去，深灰色纪念碑在后排数十株碧绿的垂柳映衬之下，更加显得雄伟庄严肃穆。

公园四周开有小渠排水，两岸插绿杨垂柳，广场四周遍植刺槐，初由美国引进。初夏绿槐夹道，花香扑鼻，气息清新，少年时代练“童子军”，参加运动会，休息便在槐荫树下。

入公园左侧为“民众教育馆”，中有花木点缀，对面有砖木结构，一楼一底图书阅览室，四周栽植夹竹桃，门前种松柏两株，图书供游人借阅。

后来，抗战日紧大半个中国沦亡。日寇对斗城时常空袭轰炸，老百姓成天“跑警报”，有谁去公园游玩。1945年日本投降，蒋介石又接着发动了内战，国民政府的经费都用于打内战，哪顾及市民游乐的公园。城乡拉丁派款，路断人稀，经济萧条，普通百姓生活日艰，更

无此闲情逸致。斗城虽有两个公园，这时是逐年荒芜。遂州公园的“穴居”是鸟飞兽散，曲池内只剩下臭水一塘，倒是前面的“扯晃坝”热闹非凡：有看相、算命、取痣、抽花书的；有讲评书、打荷叶、打金钱板、讲相声、演西洋镜、耍魔术的；有丢圈圈、开“人人宝”、掷骰子的，真是五花八门。而位于城南的船山公园，虽春有桃红柳绿，夏有水榭凉亭而很少有人问津，显得十分冷清。而民教馆却成了权势人物的“别墅”。

这里还穿插一小风波：我在一九四六年前后，为“遂宁旅蓉同学会会刊”写了一篇《遂宁船山公园建设刍议》。文内有“民众教育馆”为何闭门不纳？成了私人住宅，当时是刘洁（国民党县党部副书记）当馆长，住在里面。因之触犯了国民党在乡军人头头梁××，他极为不满，扬言要打我。我当时也找了权势人物×××谈了此事，他从中调解，不了了之。说明当时的社会，为官僚特权把持，不讲公理，不准人提意见，谁要冒犯了他们，便要拳打脚踢。

两个公园也历经沧桑，解放后两个公园有明显变迁。遂州公园解放后即为专员公署用地，公园后门封闭，地面改建办公楼、宿舍。船山公园的广场，解放后即扩大为练兵场，后来又缩小。几个草亭，几经添草修葺。在1960年，茶园近旁低湿地修建了游泳池，广场一部改建一大花园，种了很多名贵花木、花草，图案曲折，漫步其间，颇觉幽雅。园周植珍贵林木，“活化石”——水杉上百株，1960年末，苍翠丛立，增色不少。“仰止堂”前，引种竹类，幽篁森森建成小竹园。是一个幽静的好地方，花工肖克明是辛勤浇灌的园丁。

十年浩劫，广场花园内，掩埋两堆“武斗烈士”的坟墓真是大煞风景，草方亭、检阅台住上了无户籍的居民，草园亭更遭祝融之灾。

由于无政府主义，乱修、乱建、乱占，船山公园变成了“蜗庐”一隅，仅有地15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丰富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船山公园有了一些变化：深淘、维修了池塘，建了钢筋混凝土水亭，开劈了少年儿童场所。1984年又在芳草亭旧址上建起了仿古方形凉亭。1985年结合修防洪护城堤，在犀牛堤上建了“小游园”，占地3亩余，名曰“犀园”。此园虽小，但经园林工程技术人员的精心布置和管理人员维护，确实小巧玲珑。中建犀牛雕塑一座，下设月牙形小水池，喻“犀牛望月”之意，园内花草芬芳，树木已快成荫，吸引着不少市民来此游玩。特别是夏日傍晚，在落日的余辉中，面对河对岸的无际绿洲，河风徐徐，凉意阵阵，更使人心旷神怡。

遂宁建市后，城市建设速度加快，高楼大厦日渐密集，为扩大绿地休息场所，市府已将文庙北侧的15亩地全部征用，以扩建船山公园。据个人了解，该园设计以儿童和退休老人为主要服务对象，其风格以中国传统式为主。北面是中国山水园形式。开劈北湖，湖之北端建旱舫式茶室。入室品茗，可遥望船山，以借喻船山公园之意。公园西北建盆景园兼书画展览室，并扩大儿童游乐园。公园植被配置以“岁寒三友”的松竹梅为主，也插入桂花、腊梅、海棠和其它花草。此扩建工程目前正在积极施工，预计两年完成。根据遂宁市城市总体规划，在“七五”时期公园建设将有更大的发展。那时将把污浊的涪江之水变成清流涟漪，赤地红岩将变成郁郁青山。人民游在青山绿水之间已为期不远了。

吴启亮轶事

拦江 喻玄华

拦江群众未有不知吴老爷其名者，吴老爷即吴启亮，遂宁县志载：吴启亮字雪堂，署云南腾越厅（疑为府字误）同知。因法国教士过境被野人劫杀，奏参革职，寻开复原官，保升知府并加道衔。

据现存资料及口碑调查：吴启亮字雪堂，遂宁县拦江镇人，新街口住家，曾祖父吴光寿，曾祖母纪氏，祖父吴昭秉祖母虞氏，父吴隆任以子启亮诰封荣禄大夫母左氏继母杨氏，事迹均不可考，亮生于清道光初年，卒于光绪十年左右，享年六十余岁，历任云南顺宁，定远等县知县，维西通判，鹤庆镇雄等州知州，腾越同知，拣用道补用知府，加三级，赏戴花翎。

根据拦江民间传说：亮幼聪慧曾读书，十七八岁时，父母死，家道贫，无以为生，佣于镇上敬天宫罗姓茶馆内，提壶跑堂，继后，结果往云南经商谋生，亮入昆明，以串巷贩油为生，一夕，晚归寓，天甚黑，挑油篓执小灯笼沿城墙脚下踽踽行，忽一人便衣小帽，年约五旬余，急欲入道旁厕内大便，请亮以灯笼相照，亮从之，待伊入厕，方欲行，其人又请待其便毕，亮又从之，连续三夜，其人皆如是，亮无烦言，唯执小灯笼立于厕外，待其便毕乃去，而其人从未道一“谢”字，亮亦不介意，一日，数公差来亮客棧，执亮入总督府，一红顶兰袍官长坐堂上，宽面青须，势甚威武，询亮由来，亮不知犯何罪，战战兢兢跪堂下，陈由川来滇小本贩油事，官长忽令亮起立，并命坐，谓亮曰：“汝识我？”亮慑慄曰：“从未见过大人！”官长哈哈大笑曰：“汝不记三夜入厕借亮之人乎？”亮起谢不恭之罪，官长曰：“吾乃滇督岑×也，前晚便衣巡城，偶遇汝，三夜试之，皆待人以诚，今特谢汝，汝何求？”亮曰：“唯能报效国家也！”岑试亮能文，遂留为书吏，亮侍岑恭顺勤谨，颇得岑督欢心，不久即掌督署文案，数年，岑又举亮为顺宁知县，后迁宁远知县，维西通判，鹤庆镇雄等州知州，腾越同知，宣场如意，官运亨通，在任，有政声、民称“吴青天”云。

清末，帝国主义列强以军舰、大炮轰开清廷闭关锁国的大门。由于清廷腐败，在中国土地上列强横行，洋烟（鸦片）、洋教、洋货大量涌入，致使白银外流，国库空虚，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国家面临着被瓜分的严重民族危机。在严重的民族危亡之际，“驱逐鞑虏”的民族革命席卷全国，各省教案不断发生。启亮署腾越同知时，有法国传教士携鸦片烟经腾越，为群众拘拿，亮请示督府如何处置，岑督手谕，命亮将教士杀之，后各地教案愈演愈烈，由于清廷腐败，在各列强的洋枪洋炮面前，只得屈膝，而对轰轰烈烈的人民反帝运动，怕得发抖。由此，它们互相勾结起来共同对各地反帝运动进行镇压，教案始乎，云南腾越杀法国教士一事，亦被清廷追查，亮将岑督手谕交回督署，慷慨呈词，自甘冒罪，岑乃以教士为“野人”所杀报奏，清廷派员勘审、捉少数民族同胞数人，因不通语言，审讯时，凡问皆点头“唯！唯！”问“是否杀教士？”亦点头承认，因杀数夷胞，参革亮职，此案始销，越半载岑又保亮官复原职，并加道衔，死难夷胞可谓天大冤枉矣！

亮曾数次返梓，于太和坝(今莲花乡太和坝村一组)广置田土数百亩，修府宅一座，有客厅、书房、戏台、花园、鱼池等，极为富丽，光绪六年竣工，于正堂悬一红漆金字匾，上书清廷敕封其祖辈为大夫诰命等事，土地改革时，此匾分给农民彭大寿，彭作门用，至今字迹完好，现存莲花乡政府内。亮又在宅后山坡筑三冢，生前立大石碑一块，刊生平事，亮死，从云南搬尸回籍，葬后又立一碑，群众中至今广为流传“吴老爷的坟——多碑”(即多背，意为重复无益之事)，这一谒后语。又亮在栏江镇修街房数十间，形成一条小街，命名兴隆街，开场剪彩之日，锣鼓喧天，群众云集，众绅请亮前行，亮拱手谦让曰：“不敢！不敢！”此街建成，因街小背僻，每逢场期，无人赶集，于是谒后语“吴老爷的场——不赶”(即不敢)人人皆知，流传至今。

亮在遂子孙多不肖，浪荡抽洋烟，亮死不久，家产即耗尽，田土府宅归易姓，后归罗姓，其孙吴宗全解放前在栏江场镇以赌为生，一九五四年逝世，年约七十，亮在栏江之后嗣已绝，但闻其在云南之子孙尚繁。

一九五〇年减租退押时，买亮住宅之地主易衰章为狡赖退款对群众说：“我实无款可退，宅后吴老爷墓内珠宝甚多”，亮墓因被掘，出大黑漆棺材一副，亮尸着满清朝服朝靴，裹以白绫，项挂朝珠一串，每支手足各垫翘宝(银锭)一个，土白布一个，出土时须发未损，面目如生，暴于阳光下，不久即化为枯骨矣。另在栏江乡聂家大院子城嘴亦有吴老爷坟一处，乃虚设之疑冢也。

于一九八六年十月九日

斗城拾零

城关 李运焕

一、彭心明率子拜干爹 李树骅打发银二元

彭心明（字亮亭，安徽人）任遂宁县长时（1943、5——1945、12），约在1944年，曾在东门外中山路（现名解放路）大西南饭店请客，李树骅也是上客之一。席间不知为了何事，三言两语不合，李便大发脾气，将食桌推翻，菜盘落地打烂，拂袖扬长而去。彭心明是深知“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之理的，于是他探知李在颍城街县参议会楼上（现属遂宁市招待所）玩耍时，便率其小儿子前往该处，叫小儿子给李叩头，拜为干爹。李不但气消了，而且从衣袋里摸出大洋两元，打发干儿子。事后李在大西街良友茶馆喝茶时说：“老子那天不该发脾气，反而折本两元”。此事曾一时轰动斗城，传为官场现形记之一趣谈云。

二、冯焕章遂宁耍威风 李树骅成都饶冯命

冯焕章是地头蛇，参加了青帮和红帮，家住北郊今县农场地址，约在1944年夏季的一天下午，冯在遂宁东门外现在麦村后面楼下（那时是茶旅馆）喝茶乘凉。楼上一男人倒水，不慎溅了一些水在冯的衣服上。冯就大发脾气，出言不逊，破口大骂。于是那人便拿言语给冯赔礼道歉，并称愿给冯大哥换件龙袍，冯仍骂不绝口，那人便说，可请哥老会评理。冯气势汹汹地说：“袍哥人家，要脚不会拿手！”事后那人向成都哥老会告状，于是哥老会传堂，大会由成都市疏散区警备司令兼哥老会舵把子李树骅主持。那人说：“冯大哥说过，袍哥人家，要脚不会给手，就请冯大哥下一只龙膀（断一只手）！”说罢，把一把雪亮的马刀往桌上一丢，铿然有声，冯焕章理屈词穷，威风扫地，只好向李树骅跪下拉着衣衫哀求饶命。李树骅向大家请求，宽恕他这一次，冯才免于杀身之祸，当众叩头，开了茶钱狼狈而去。

谢绍周先生诗选录

川北教育学院 蔡 忠

先生名大澍、字霖，号绍周（亦少周），笔名瞿秋。遂宁县第三、四届政协委员。工诗书画，系教育界老前辈，在遂宁文化教育界享有盛誉。兹选录题画诗七绝八首于后：

雨 景

淙淙急雨乱泉鸣， 洗净尘埃眼更清。
莫道哥哥行不得， 于今世路最分明。

村舍新亭

青山红树古时苔， 村舍新亭傍水开。
隔岸小舟频荡桨， 课耕岂为酒旗来。

提 灌 站

绿柳红桃两岸间， 高楼稳居一房山。
凭栏遥指前村里， 提灌新抽水一湾。

玉 兰

玉骨冰肌迥出尘， 雪儿或恐是前身。
琼宫昨夜新移种， 可是群芳第一春。

牡 丹

沉香亭北玉楼东， 金缕霓裳掩映中。
不是有心轻弄色， 生来丽质自清雄。

梅 花

东风昨夜送春来， 枝北枝南处处开。
不愧万花头上客， 昵人最是暗香催。

荷 花

争夸艳色迈群芳， 绰约丰姿似六郎。
任是淤泥都不染， 鉴湖百里有余香。

玉 簪

小窗幽处玉无瑕， 知是琼宫第一花。
素女何年曾坠地？ 偶侵珠露几枝斜。

从黑暗走向光明（连载）

第五部份 认定真理 永不回头

——起义后的工作和学习

永 济 赵洪轩

一、荣膺新命 为国为民

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16兵团起义后，番号没有变动。在川西受贺龙总司令指挥。

人事作了调整。由董宋珩任16兵团司令员，曾懿元任副司令员，杜庸任参谋长。辖41、47、74三个军和一个独立纵队。据说共五万多人。老弱残兵在内。

41军由蔡证任军长。所属122、124、301三个师。

熊顺义任122师师长，黄伯亮任副师长，罗杰任参谋长。苏德生任366团团长。

高先哲任124师师长，李作夫任副师长，李良策任参谋长。苟昭禄任370团团长，叶仁孚任371团团长，赵鸿（洪）轩任372团团长。

张则荪任301师师长。田颖、陈伯光等任团长。

刘崇素任独立纵队司令员。蔡鼎勋、王哲贤等任团长。

董云威任兵团警卫团长。（董宋珩之子）

47军由严整任军长。所属125、127、302三个师。

张子堯任302师师长，贾绍道任参谋长，彭守雍等任团长。

师团以下人事，也作了调整，有升有调。但变动都不太大，以安定军心。每事有人负责作主，学习为人民服务。

事隔三日，我们军营内外，已是五星红旗招展，革命歌声嘹亮，景象焕然一新。

部队的人员，武器弹药、装备器材等都作了切实清点。造好实有官兵花名册、武器弹药装备器材清册，逐级具报上级。向党和人民，负责交待清楚。经济方面，国民党发给部队的银元券，早已成了废纸销毁了一无所存。我团更穷，连一个军需主任也没有。

从1949年12月21日起义之日起，部队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供给制供给。伙食供应大米每人一天一斤半。菜金分大灶、中灶、小灶。战士和排、连级吃大灶，（当时使用旧人民币）每人每月菜金二万五千元。营团级吃中灶，每人每月菜金四万多元多一点。除菜金外，还有津贴费、金额与菜金差不多。我一个月领菜金和津贴费共是九万元左右。被服和生活用具，官兵一样发给。

机关的办公费用实报实销，杜绝贪污浪费。